

《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

呈现中国万年“玉文化”

中国神话学会会长、文学人类学家叶舒宪先生主编的《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一书，试图从物质文化研究的新视角，审视我国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年的文明史。该书聚焦的物质文化，具体而论是“玉文化”。

众所周知，世界各大文明古国的史前文明，往往是由神话所书写和塑造的。作者在对世界各大神话作比较研究时发现，其他古文明都始于崇拜黄金的神话价值观，唯有中国文明始于崇拜美玉的神话价值观。与此同时，玉文化也是中国文明进程中的重要支脉。人类古文明通常以石器、青铜、铁器等物质为分类标准，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在由石器走向青铜时代的路途中，华夏的史前文明发明了“石之美者谓之玉”，且赋予了玉石超越物质的审美和精神层面的价值。

作者依据考古发现的史前材料，认为中国人崇玉、尚玉的文化可追溯到距今一万年的旧-新石器时代。若将这一万年的玉文化叙事从中间分为两段，可划分为“上五千年”和“下五千年”。《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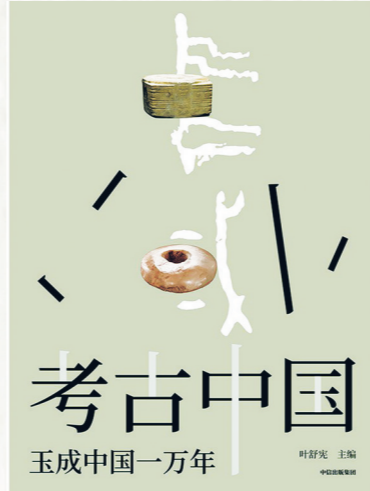
成中国一万年》的前七章中呈现的是“上五千年”；从万年前的辽宁阜新查海文化玉器辉煌，催生出以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玉器大繁荣，再到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和随后的龙山文化，中原仰韶文化与长江流域屈家岭文化的互动，以及距今五千多年的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登峰造极，这些重要遗址都透露出自中华“上五千年”的社会生活信息，合起来构成一幅玉文化自北向南发展，先传播覆盖东部沿海地区，再自东向西发展的全景图。

后四章中展现的则是“下五千年”；包括在唐尧虞舜到夏禹夏启建国间，考古发掘四大遗址中的玉器分布情况，分别是江汉平原的史前玉器，以肖家屋脊遗址为代表、甘肃青海一带的齐家文化遗址、陕北黄土高原的石峁文化遗址和广东韶关的石峡文化遗址。四地的玉文化面貌相距数千千米，各不相同，其中的后三者明显传承着“上五千年”长三角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体系，即都以玉璧、玉琮、玉钺、玉璜的组合礼器为核心。这就清楚地显示出

史前玉器体系化、成熟化的标志为良渚文化。在良渚文化消亡之后，这个体系并没有伴随江南良渚古国的覆灭而消失，反而是向中原、南方等几个方向不断传播；经过数千年的发展铺展，玉文化在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从甲骨文的构形来看，商朝的国号“商”字，代表王者之器的玉璧的“璧”字，代表王者的“辟”字，神圣化动物“龙”字和“凤”字，这五个完全不同的字中，都有一个标记神圣化美玉的结构要素。

综上，玉文化从发端至今，大约刚好构成整整一万年以玉器为主角的历史叙事。

值得一提的是，华夏地理空间分布的东西两极方向，恰好分别储藏丰富的优质玉矿资源，这是人类独有的玉文化发生和发展的自然条件基础。在东北极方面：玉矿资源储备以濒临鸭绿江的辽宁省岫岩玉和宽甸玉为代表；西极方面：玉矿资源包括新疆和田的昆仑山脉和喀什地区的喀喇昆仑山脉，绵延数千千米。北面是贝加尔湖西南岸山地的优质透闪石玉矿（俗称“俄料”），是全球范围内



玉质仅次于新疆和田的高等级玉料；这也是整个欧亚大陆上驱动旧石器时代后期玉文化率先发生的物质基础。南面则是与云南省接壤的缅甸山区全球最优翡翠矿。贝加尔湖玉矿的资源，自一万年就开始向国内方向传播，对于我国玉文化的发生也起到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文丰 文/图

书评

《她走过无数人间》：

读萧红不会使人苍老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文/图

萧红常与无数个标签联系在一起，比如“民国才女”“黄金时代”“文艺青年”等。想到她，我们就会想到她的《生死场》《呼兰河传》《商市街》等代表作，亦会想到她和萧军、端木蕻良的感情生活，想到鲁迅、胡风、茅盾对她的关心和提携……萧红的作品，对于喜欢她的读者来说，已经比较熟悉，但萧红的形象，总像雾中的身影，时而清晰时而模糊，这让她不断被标签化有关，也与一些语焉不详的个人史有关。近读张莉新书《她走过无数人间》，得到的收获是，那个总是处在被理解与被误解之中的萧红，走出了迷雾，真实地站在了读者面前。

张莉对萧红的关注与研究，以及围绕萧红的写作持续了25年。这些年，她以阅读、比对、创作、发表等多种方式，不停走进萧红的世界。《她走过无数人间》分为序言、讲义、余论、附录，后记5个部分，既具备学术价值，又突破了学术界限，对萧红进行了多维度讲述——从萧红的生活情境、到萧红的人生履历，从萧红作为普通女性的生存挣扎，到萧红作为个性作家的敏感独立……张莉用草蛇灰线、一唱三叹式的讲述，以感同身受、共情共鸣般的立场，有效打破了文论天然的边界，使包括讲义部分的内容也充满了亲切之感。本书虽然没有被命名为“萧红传”，却不折不扣地拥有人物传记的真实、饱满与客观。

读完《她走过无数人间》，读者会在民国东北女性萧红与现代作家萧红之间，建立多线索的联系，会发现这两个身份之间，是互为镜像甚至是相互成就的关系。早逝的母亲和暴躁的父亲，使萧红的童年与少女时代被灰色调充斥，来自祖父的疼爱成为唯一的安慰来源。萧红的敏感与不安全感，使她始终能敏锐地捕捉人物情绪与环境变化，进而能

够用文笔精准地呈现出来。在被寒冷与饥饿裹挟的日子里，她也可以用期待、童心甚至是幽默来化解无处不在的苦难——这些无形中促成了她必然成为优秀作家。但写作反而也促使萧红不断回望与审视，作家的理性与清醒，解决不了生活与情感层面的窘迫与困顿，因而萧红的一生是被文学支撑起来的一生，但是无法摆脱悲伤与凄清的一生。萧红的哀与荣和时代、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她的英年早逝是身心内外承受巨大消耗使然。

《她走过无数人间》全书有股凝练的精气神，因为作者文笔始终聚焦于解析萧红的人生轨迹与阐述萧红的文学成就，再度确认了她秉承“生活就是文学，文学就是生活”的创作态度所产生的非凡影响。在“白话文运动”之后，萧红的文学语言洗练、准确、感染力强。虽然有说法称，萧红的小说创作受到鲁迅的影响较大，但萧红文字中浓烈的个人特征以及女性立场，用当下眼光来看，有着鲜明的独创性和风格化。萧红的作品无法用小说、散文、诗歌等体裁进行严格框定，就在于她创作上的无意识，达成了近乎完美的“我手写我心”，这并非简单用“大胆、真实”所能概括的。萧红的作品以时而旁观时而在场、时而轻灵时而凝重的笔触，不断冲击、消解残酷、疼痛、悲伤等情绪。她与她的作品，如茫茫雪地里一抹鲜艳的虹霓，虽然看着遥远，但在视线里容不得任何抹杀。

萧红逝于1942年，她的生命体验和文学生涯，于此都同时止步。“她走过无数人间”，这一命名与评价角度，重新构建了她与人间的关系。在这一关系架构之下，她不再只是在呼兰县、哈尔滨、北京、青岛、上海、香港等地停留过的现代女性。她在不停阅读自身与内心的同时，也在持续对照人间变化、世事无常，给出属于她的看法与意见。诚然，在她看来，这些看法与意见或许并不那么重要，但只要能够穿越时间为后人所看到、感受到并真诚地觉得有价值，那么她留在人间的形象、故事、文字，便拥有了无可阻挡的穿透性与锐度，她便不仅是写作者萧红，更是思想者萧红。

《她走过无数人间》之后，萧红必将会被不断展开或深入讲述，萧红作品的可读性与萧红故事的延展性也会处于提升状态。读萧红，尽管读者要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换位思考能力，但有一点可以确认，读萧红不会使人苍老，反而会使人内心变得年轻——如果敏感、生动以及执着是年轻人特有表现的话。



《京华乡情》：

呈现京郊大地烟火气息

仇秀莉的长篇报告文学《京华乡情》让更多读者知道，北京不仅拥有深厚的城市文化，还有多彩的乡村文化。

作者在书中记录了北京45个具有代表性的村落，既有韩村河、挂甲峪、古北口、司马台等家喻户晓的名村，也有众多鲜为人知却独具魅力的村落，如离市中心并不遥远的高碑店村、“村改居”的幸福村庄霍家营、致力建设“农业中关村”的峪口村、打造“平谷大桃”金字招牌的峪口村、打造“平谷大桃”金字招牌的峪口村、打造“平谷大桃”金字招牌的峪口村。书中还书写了因地道战闻名的焦庄户村以及以孝行闻名的仇庄村等。

仇秀莉的创作素材源自实地探访与采访收集。她用脚步丈量京郊大地，先后走访了北京近百个村庄。每到一处，她参观乡情村史陈列室，走访村民，通过深入交流和面对面访谈，了解当地的乡山巨变。历时3年，她将搜集到的生态建设、乡村振兴故事，文化传承、民族团结见闻，科技兴农、返乡创业事迹等如实记录下来，奉献给读者。阅读她的文章，我们仿佛身临其境，能真切感受到那份自然与真实。

我们从书中看到京郊生态文明建设的壮丽画卷。昔日靠山吃山的矿山村，如今已华丽转身为养山护山之地。我们还能读到城里鲜见、却在乡野间生机勃勃的民间文化，比如长城脚下的千年庙会、石堡村的踩高跷技艺等。我们更能看到广袤乡村大地上涌现出的一批网红达人，他们借助网络平台，将特色农产品、休闲农业与民宿等推向更广阔的市场。这些鲜活人物与动人故事，带着浓厚的时代气息。

可以说，《京华乡情》中的京郊村庄是城里人的“诗和远方”，在发展休闲农业、民宿旅游、生态农业、观光经济等方面颇具潜力。仇秀莉的走访，是一次京郊美丽乡村之旅，让我们对北京有了更为全面和立体的认知。

李朝全



《熟食动物》：

从火的使用与烹饪看人类的进化

我们从哪里来？是什么造就了人类？面对这两个问题，历史上的每种文化都曾从不同的角度做出过回答，但能破解其中真相的还是科学。著名灵长类动物学家理查德·兰厄姆新译为中文出版的《熟食动物》一书，挑战了传统的人类演化理论，提出烹饪在人类演化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人类学界、考古学界通常认为，在猿类进化到人类的过程中，存在着“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的演化链条；而在使南方古猿演化为直立人的推动力上，主流的观点是“吃肉”。研究者梳理了远古人类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几百种狩猎文化，发现肉类在它们的日常饮食中占比很高，通常要提供一半乃至更多的热量。考古学家认为，注重肉食的习俗可以上推两百多万年，一直追溯到懂得屠宰猎物的“能人”。人类学家认为，吃肉的兴起促成了人类的许多特点，比如善于长跑、体型变大、智力提高、合作增加。基于此，“吃肉”一直是人类学家解释南方古猿演化为人类的主流学说。

但是，“吃肉”也分为“生食”

和“熟食”两个阶段。众所周知，动物是靠着生食繁衍生息的。传统观点认为，同样是动物的人类，吃生食自然不在话下，且许多食物很适合生吃，比如苹果、西红柿、牡蛎，还有各种鱼；历史上有关人类吃生食的故事也不胜枚举。但研究者通过“人类生食实验”证明，严格的生食饮食无法供应充足的能量。换言之，生食无法支撑人类持续进化为现在的样子。其中的关键，在于“火”的使用，以及用火烹饪的“熟食”。

火对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达尔文曾说，生火的手艺“恐怕是人类有史以来，除语言之外最伟大的（发明）”；著名美食家让·安泰尔姆·布里亚-萨瓦兰提出，“人类用火驯服了自然”；人类学泰斗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影响深远的《生食和熟食》一书中写道：“烹饪确立了动物与人的区别……不仅因为烹饪代表了从自然向文化的转变，还在于人类状况的全部特征都是在经由烹饪之后才得到定义的。”他敏锐地注意到，烹饪是人的一个决定性特征。

人类会使用火之后，生食得以烹饪为熟食，这一变化对人类

进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类的祖先学会烹饪后，肉类变得更容易消化、更安全、口感更为丰富和爽口，并能延缓食物变质的速度；同时，烹饪能增加人类从食物中获得的能量，人类的身体为了适应熟食而发生变化，经自然选择塑造，变得能够充分利用这种新的饮食方式，而且解剖结构、生理特征、生态行为、生命历程、心理状态和社会形态也都随之改变；又由于狩猎主要由男性去做，女性便担负起烹饪工作，烹饪直接促进了人类家庭的出现。总之，因为火的使用与烹饪，人类比过去更容易生存与繁衍。

“人类是懂得烹饪的猿类，是火焰的造物。”围绕这一核心观点，书中通过分析生食与熟食的对比、烹饪对消化系统的适应，以及烹饪在能量获取和人类演化中的作用，揭示了烹饪如何成为人类从动物式生存转向更完整人类生活的关键因素。此外，作者还深入探讨了烹饪对智力、社会行为、婚姻结构以及人类演化的广泛影响。作者指出，烹饪不仅提升了人类的能量获取效率，还促进了大脑发



展和社会结构的形成。也因此，作者在书中将人定义为“会烹饪的动物”：“野兽都有记忆力、判断力，以及与我们的心智一样的各种官能和情绪，只是程度有所不同，但它们没有一个会烹饪。……只有人能够烹制佳肴；而且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烹饪天赋，懂得怎么给食物调味。”

现而今，人类早已习惯熟食，与之密不可分，它带来的影响从身心两方面融入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文丰 文/图

《树的呼吸》：

尊重生命智慧 聆听森林呼吸

德国知名森林学家和科普作家彼得·溘雷本长年致力于环境保护事业，其最新译介为中文出版的《树的呼吸》一书，从揭示树木不为人知的智慧与韧性，到批判以人类为中心、忽视生态规律的现代林业干预，最终落脚于一种谦逊的、基于信任的森林未来构想。全书充满了对森林生命的细致观察、对现代林业干预的深刻反思，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叩问。

全书分为“树的智慧”“林业的无知”“未来森林”三章。第一章“树的智慧”，主要讲述的是树木为了生存所发展出的能力与智慧。人们通常将树木视为被动、沉默的存在，但树木面对自然环境不是束手无策的，它们将上万年来的经验存储在种子中，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还会通过树根识别自己的亲友，为彼此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同时携手调节区域气候，以便整个族群茁壮生长，哪怕是面对气候变暖，森林也展示了一定的应对之道。其中最

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对欧洲七叶树在连续干旱与虫害压力下“反常”开花长叶的深度剖析，这一现象在常人眼中或许是树木“错乱”或“濒死挣扎”的征兆，但植物学家有力地论证了这是一种基于生存本能的、高风险的能量博弈策略，即树木在极度“饥饿”状态下动用最后的储备，试图在寒冬前制造养分以求生。在这一章节中，作者通过大量生动实例，构建了一幅充满主动性、学习能力与社会性的树木生命图景。

第二章“林业的无知”，主要以德国林业为对象，揭露了林业人对森林（树木）自主性的忽视与低估。批评的核心在于指控人类林业活动常常建立在一种“无知”之上。首先表现为动机的功利性。现代林业往往将森林简化为木材生产的经济单元，其管理措施旨在最大化木材产出和经济效率，却粗暴地割裂了树木之间、树木与土壤微生物之间亿万年协同进化形成的复杂联系；其次体现在认知的局限

性。人类对森林生态的理解仍是片面的。作者指出，即使是“植树造林”这种看似正确的环保行为，若树种选择不当、种植方式违背自然演替规律，也可能破坏土壤、耗尽水源，最终事与愿违，制造出脆弱且缺乏生物多样性的“绿色沙漠”，而非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森林。书中隐含的一个强烈对比是：面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压力，自然森林依靠其智慧与网络展现韧性，而人工林则往往大规模死亡。

简言之，人类的“无知”体现在无视或严重低估了森林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树木的自主性上。这本质上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人类自认为比自然更懂得如何“管理”森林，却忽略了森林自身是一位历经数百万年磨砺的、最高明的“管理者”。

面对上述问题，作者在第三章“未来森林”中提出了一条充满希望的出路。这条道路的关键词是“谦逊”与“退让”，表明人类在很多时候只需要放下一些“主动性”，认可树木的智慧，让森林自



行恢复。这意味着，未来的森林管理应更多转向“近自然林业”或保护模式，核心任务是设立保护区、减少干扰，让森林遵循自身的演替规律恢复结构、重建地下网络、积累群体智慧。人类需要扮演的角色，从一个自以为是的设计师和管理者，转变为一个谦逊的观察者和谨慎的辅助者。正如作者所言：“我们只需旁观，让森林自行恢复，这便是对其最好的帮助。”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文丰 文/图